

精典文库

Zai Wen Rou Zhong Piao Zhi De Mei

在温柔中飘逝的美

一

潘凡佳 王必
七编

精典文库

在温柔中 飘逝的

潘凯雄、王必胜
选篇

春风文艺出版社

序

潘凯雄

近两年，一到岁末年终来完成辽宁人民出版社交办的“文学年选”任务时，心绪总免不了些许惶恐与忐忑。由于选择过程中的审美本身客观上就存在着见仁见智的不同，亦即习惯上说的“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正如学者所言，“在中国的传统中，选本一直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环节，各式各样的选本保留了文学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的原始初态。”

倘以此来衡量入选这个选本中的随笔篇什，应该说还是名至实归的。这些篇什至少是篇篇有特色、有个性，读了不会令人大失所望。其文字、其情感、其表达虽各不相同，也参差，但又确是各有各的招，各有各的路。将其集为一书，倒也琳琅满目，煞是好看。比如那些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那些充满哲理的玄思；那些在古今中外历史与典籍中的徜徉；那些对昔日往事的款款追忆……读后都足以令人掩卷长考，回味无穷。

本选本没有强作分辑处理，只是依据个人的理解将其内容相近者集在一起，虽难免互存交叉，但似未太离谱。而之所以如此处理，一则希望读者能从中见出全年随笔写作的整体风貌；二则读者也不难看出，即使是同一内容，作者的表现又是如何地不同。至于对具体作品的评说，我想每一位读者心中都存有自己的秤，毋需在这里饶舌了。

最后，有必要对编选对程中的两个技术性问题略作说明：





第一,为了能让更多的随笔篇什入选以反映这一年中随笔写作的整体风貌,不得不对一些篇幅较长的随笔进行了“节选”的外理。对这种“粗暴”的腰斩敬请原文作者和读者予以见谅;

第二,对入选本选本的作者,我们大都以不同方式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但也有少数入选作品的作者,因我们的孤陋寡闻,尚无法及时与之取得联系,只是又不忍割爱,故冒昧将其大作选入。在此,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歉意与谢意,并请这些作者见到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需要重申的是,因个人阅读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比如,在网络与一些新锐报刊上出现的随笔就几乎未能涉猎,他们那个性卓然的语言其实也是很应该值得关注的。好在每一位读者同样也是一位编选者,他们一定会用自己丰富的阅读填补我们这个选本的不足。每念及此,那惶恐与忐忑不安之心方能有所舒缓。

2003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孙 郁	苦雨斋旧事(节选)	(1)
孙 颢	思想的秘密(节选)	(18)
田中禾	眷念皇帝	(29)
何向阳	木兰辞(节选)	(36)
王开岭	古典之殇	(48)
冯伟林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节选)	(56)
李洁非	磨合	(70)
梁 琴	书院三章	(88)
李永鑫	人间清白	(102)
易洪斌	霜锋铮(节选)	(115)
余 华	什么是爱情	(127)
王海玲	肖邦的“手指”断了	(129)
朱增泉	朱可夫雕像	(135)
马 原	我挚爱的马铁奥	(150)
格 非	博尔赫斯的面孔(节选)	(161)
赵 玫	特瑞萨为帝国而战	(174)
卢 岚	拿破仑的文学世界	(186)
程乃珊	海上男女	(192)
阿 黛	双城男女北京 VS 上海(节选)	(200)
朱金晨	“新雅”里的文人	(217)
舒 婷	生命年轮上的绿肥红瘦(节选)	(225)
迟子建	在温暖中流逝的美	(236)



叶广芩	主妇杂记(节选)	(239)
周晓枫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节选)	(251)
高叶梅	岁月如何改变了我的模祥(节选)	(263)
商子雍	乞丐是一面镜子	(278)
	黑哨二题	(280)
邵燕祥	官升“品行”长吗?	(283)
盛大林	打工者为何不愿当“华西人”?	(285)
	历史永远都不会有“定论”	(287)
束学山	议论县委书记之死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290)
舒展	为啥想念侯宝林	(294)
	外逃贪官的末日来到了?	(296)
司马心	不必等待	(300)
司马心	如此“显学”	(302)
司徒伟智	该为“放大效果”惊叹	(304)
	松解“吃一刀”情结	(306)
黄集伟	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节选)	(308)
黄一龙	何止“三十”年!	(312)

苦雨斋旧事(节选)

孙 郁

八道湾十一号

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处面积约四亩的大宅院。1919年7月,鲁迅以三千五百元购下了此地,同年底,鲁迅的母亲、夫人朱安,及周作人、周建人的全家陆续搬至于此。

这是鲁迅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私宅,也留下了诸多可以感怀的故事。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故乡》以及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诞生于此,他的译文集《桃色的云》、《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也在这里完成。但1923年8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八道湾,直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八道湾十一号院的主人,一直是周作人。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比鲁迅小四岁,初名魁寿,字星杓,他后来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作人,一直沿袭到老。他的笔名颇多,尤以知堂、启明等知名,所以世人也每每称之知堂老人。又因为是鲁迅的胞弟,排行老二,遂又有周二先生之称。

大概是二十年代中期吧,周作人常称自己的书房为苦雨斋,这个名字在文坛渐渐响了起来。查俞平伯、钱玄同等人日记,苦雨斋出现的频率颇高,几乎成了八道湾的代名词。周作人自己也戏称是苦雨斋老人、苦雨翁等。

之所以将此取名为苦雨斋,乃是因为周作人住的小院地势过





低,每逢下雨,积水难排。1924年,周作人在《苦雨》一文中,曾有过隐约的解释: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糊里糊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

苦雨斋系周作人读书写作的地方。那间房子原为鲁迅住所,很有一些情调。周作人后来会客,一般都在此处。从1920年至1945年,造访过这里的文人颇多。查鲁迅、周作人日记,人员有宋紫佩、许季上、齐寿山、孙伏园、张凤举、萧友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郁达夫、徐志摩、胡适、许钦文、马裕藻等,此外,川岛、江绍原、俄国诗人爱罗先珂,也曾住在这里。鲁迅离开八道湾后,那里仍是友人聚会的场所。1924年元旦,到周宅的客人有:马幼渔、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祖正等;1925年元旦聚会者是:钱玄同、马幼渔、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陶晶孙、川岛、孙伏园等。直到30年代,到周宅者,大抵这些人物,关系较密的,又多了废名、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等。气氛较之先前,没有多大差别。除了元旦的大聚会外,每月还有零星的小聚,地点也大多在八道湾。自从周作人将此处称为苦雨斋后,它几乎成了沙

龙的代名词了。

1926年,在为《狂言十番》写的序言之后,周作人的笔下出现了苦雨斋字样。此后写文通信,落款或为“苦雨翁”,或“苦茶庵”。一个“苦”字,外化着作者的心境,也隐含着自已的无奈吧。中国的隐士和遗民,常爱在诗文中用“苦雨”这类意象。晚明的伯子《与李咸斋》云:“苦雨连旬,云生窗户,岩溜噪耳欲聋。”晚清的罗振玉1916年2月6日在致王国维信中说:“今日苦雨而无风,不知舟行如何。”文人们喜谈“苦雨”,正像吟风弄月,不过心绪的闪光,难说有什么独特的深意。只不过于此可感受到别样的情调而已。周作人后来以“苦雨翁”自娱,其实也有点笔墨游戏的意味儿,书信、文章之后的署名,也印有他性格的一面。这与他的文章内蕴,还是相吻的。

往来苦雨斋的人物,大多是京派文人,趣味、爱好相似,又多不谙政治,是一些颇有学识的人。这里的核心人物是周作人,其次为钱玄同。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刘半农、马幼渔等是平辈的,俞平伯、废名等,则对上述诸人,执弟子礼。不过他们并无精神的界限,彼此以友人称之。说其系挚友,原也对的。除江绍原等极少数人有留学美国的文化背景外,众人大多留学过日本,或求学于北大,东方气息很盛。与胡适那个圈子,和后来金岳霖、林徽因那个圈子比,格调是不同的。这个沙龙的文化情调,无论在左翼文人眼里,还是西洋学堂毕业的人眼里,均有些格格不入。他们讨论的问题,研究的对象,至今在学术界还是清冷之学。

八道湾十一号院是个清幽之所。谢兴尧在《回忆知堂》一文中,曾这样描绘过对它的印象:

周的住宅,我很欣赏,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进入室内,知堂总是递一





纸扇，乃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糊以棉纸，轻而适用，再递苦茶一杯，消暑解渴，确是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俗扰攘之地。

后来结识过周氏者，对苦雨斋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任访秋、李霁野、张中行、文洁若、邓云乡等，都从其间感到了别样的气息。看文人对八道湾的追忆，多有一种神往的感觉，其间的话题，多种多样，趣味多致。苦雨斋是个难以说清的存在，惟其如此，才引来各种人的复杂的评说。我有时翻阅周氏兄弟的著作，以及同代人的书信、日记，不禁有种走进其中的渴望。但往往不得要领，好似隔膜着，看不清其中的面目。可是我们倘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史，又不得不在这里驻足，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化史，有许多是与此紧密相关的。

在一个深冬里，我和一位友人造访了西城区的八道湾。那一天北京下着雪，四处是白白的。八道湾破破烂烂，已不复有当年的情景。它像一处废弃的旧宅，在雪中默默地睡着。那一刻我有了描述它的冲动。可是却又有着莫明的哀凉。这哀凉一直伴着我，似乎成了一道长影。我知道，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那么轻松。我们今天，也常常生活在前人的背影下。有什么办法呢？

京派重镇

鲁迅离开八道湾后，到那里造访的客人一般也与鲁迅有些来往。其实像钱玄同、刘半农、川岛、张凤举、徐祖正、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等，既是周作人的友人，也是鲁迅的朋友。但是后来，鲁迅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越来越隔膜，变得生冷起来了。这生冷的原因，一是周作人等人和激进的文化有了冲突，不喜左翼的腔调；

另一方面呢，他们渐离生活，迷恋学术，颇有些象牙塔气了。先前的时候，周作人还和“现代评论派”正面对峙，很有点斗士气，但后来却温和起来，像胡适、徐志摩也成了苦雨斋中的贵客，鲁迅对此是警觉的。1929年8月17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我看，现代派诸公，是已经和北平诸公之一部分结合起来。这是不太好的。有什么办法呢。

鲁迅的推测，有一半是对的，即周作人等，已不再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相对立，且成了他们中一些人的朋友。可是另一方面，苦雨斋的沙龙，还依然保持了五四初期的纯净之气，未被时尚气所传染，这些，鲁迅大概忽略了。

沈尹默有一篇文章，回忆过八道湾聚会的盛况，真是让人感动。这氛围一直持续了多年，给京派文人，以不小的兴奋。苦雨斋的客人们多自由、洒脱之状，或狂狷如钱玄同者，或古怪深厚如废名者，风格各有不同。每次聚会，谈话的内容颇广，有讥时之调，亦多学术切磋。那些谈天的内容，有时在他们自办的《语丝》上刊出，很有名士之风。刘半农在巴黎的时候，看到周作人寄来的《语丝》，对苦雨斋的友人们竟生出神往的幽情。在寄周氏的信中不胜感怀：

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厚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我希望回国之后，处于你们的中间，能使我文学的兴趣，多多兴奋一些。

刘半农后来，真的成了苦雨斋中的常客，大凡到过八道湾的，





对那里都有较浓的印象。像废名、俞平伯、沈启无、江绍原等,将苦雨斋视为了生命之所,这些从书信之中,多少可以看到。苦雨斋里的人,彼此有点师承关系。如周氏、钱玄同、沈兼士等,系章太炎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则系周作人的学生。而俞平伯的祖父俞曲原,又是章太炎的老师。这个关系,颇为有趣,也带有传统士大夫的痕迹吧。鲁迅疏离这个圈子,那原因也许正在于其中的旧气,这些他是不喜欢的。在上海的时候,到鲁迅寓所去的,大抵非学院派的血性青年,这和苦雨斋形成了反差。或许,由此出发,亦可摸到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原因?

不过,苦雨斋的文化视界很广,并非狭隘的小圈子。对外人,亦非排斥的态度。1930年6月12日,胡适造访周宅,晚宴上作陪者系:马隅卿、江绍原、俞平伯、徐耀辰、刘半农、马幼渔、钱玄同等。这里,江绍原与胡适较密,对美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苦雨斋中的友人,对胡适较为尊重,像钱玄同、沈兼士等,就自认从胡适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众人眼里,他们与胡适,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实际上,周作人与江绍原讨论的问题,大多是西方学术引发的,如性心理、民俗、宗教等,内容并无旧气。而他和钱玄同等人切磋汉字改革方略时,思想是异常解放的。苦雨斋中人,情感方式,带有旧文人的一面,但精神,大抵是新式的,不过有点“为学术而学术”罢了。1928年6月19日,江绍原在上海时,曾写信给周作人,可见他们那时精神的兴奋点:

启明先生尊寄丙寅医学社编辑的周刊一份,已收到。该社有一位姓李的社员,与我认识,故已函伏园,请他用贡献与医学周刊交换。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似已来上海,报载北大同学会举他和另几个人为代表,呈请大学院勿使北大易名中华大学。周刊作者诸君的几个提议,正是我想提议的。学校中应添医学常识一门功课

外,又应编辑一两部通俗的书,为接引一般人之用。又学校中所授的“医学常识”,似应兼及医学史及旧医学辟谬。日本医学革新的经过,必定极足供我国人参考,我不能从日文书中详考之,真是憾事。今日见清华所出王静安专号,有数文(例如陈寅恪的一篇)似带尊王气息。“北伐成功了”——据说。北京有无新气象乎?暇时写示一二为祷。上海方面的赵景深、顾均正、徐调孚,均喜研究民间文艺,我颇想怂恿他们组织一个类似民俗学会的团体。已有信去劝进,效果如何,容后报。

江氏的行文,有儒雅之风,而内容则颇为现代。难怪后来左翼文人抨击苦雨斋时,俞平伯曾出来为之辩护,以为并无没落之志。懂得苦雨斋苦乐的人,在那时并不很多。

看周作人日记、书信,以及后人的回忆,觉得苦雨斋确是个特异的存在。周氏周围的人,在学识上均有不俗之见,马幼渔、钱玄同之于音韵文字,俞平伯之于昆曲、“红学”,废名之于禅宗、六朝文学,张凤举之于日本文化,均为上乘。但他们影响最大的,并非这些,而是1924年11月创办的《语丝》和1930年5月创刊的《骆驼草》。这两本杂志,非学术论苑,而是随笔、小说的园地。众人或于此谈天说地、臧否古今人物,或潜心于创作,周作人、废名的许多随笔,发表于此,影响很大,以至成了“京派”文人的重镇。由一个沙龙而引发出一个文学流派,这在苦雨斋中人而言,是无意形成的吧?

我以为研究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不可不观顾苦雨斋。然而许多年来,这个沙龙的资料甚少,而且模糊。我在翻阅、采访中,偶得到一点线索,便有会心的一笑,觉得可探讨的空间,那么广大。中国读书人的冷热、曲直、忠邪;于此都可感到的。





一点涟漪

有一段时间,大约是1923年吧,诗人徐志摩出现在苦雨斋里。周作人的日记,也多次记有徐氏的来访。徐志摩和周作人只能算是一般的友人,彼此之间,亦有隔膜的地方。按周氏的性情,对徐志摩那样罗曼蒂克的文风,不会喜欢。但本着尊重他人个性的原则,周作人不爱对别人指手画脚。徐志摩对于苦雨斋主人,不过一个真性情的诗人,至于思想的深与浅,艺术的高与低,那是另一回事了。

周作人与徐志摩真正发生关系,缘于周氏兄弟和陈西滢的一场冲突。1926年,那时候徐志摩已接编了《晨报》副刊,徐氏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对鲁迅、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陈西滢的论战,说了许多劝解的话,然而情感上偏向陈西滢。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不满,以为是对正人君子辩护。徐志摩为陈西滢说话,在周氏看来是一种糊涂,抑或无聊,所以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对徐志摩略有不敬:

徐先生是个诗人,诗人多少有一点迂的,所以有时要上小当,看不清事实。我是个俗人,土匪,或者也是学棍,(还有什么呀?)坏事大约做了不少,坏事也就知道得不少;失败也时常,然而为正人君子所瞒过的时候却比较地不很多了。徐先生糊起一个蜃楼来,我就把它戳上两个小窟窿,说世上不大有这种美景,虽然没有什么恶意,但也很对不起他。不过这也怪不得我,只能怪我们的眼睛生得不同,因为徐先生是天生的诗人眼,飘来飘去到处只看见红的花,圆的月,树林中夜叫的发痴的鸟;我的呢是一双凡胎肉眼,虽然近视,却已望得见花底下

的有些不洁。徐先生说，‘拿了人参汤喂猫，它不但不领情，结果倒反赏你一爪’。这一句很漂亮的话倒正可以拿来作我读了他的好文章反而去顶撞他的这件事的批评。

这里对徐氏的看法，倒让人想起鲁迅评价徐志摩的话，大意是相近的。在徐志摩眼里，鲁迅过于苛刻，不好接近；而周作人自然有可爱的一面，虽然先前略有冲突，后来与周作人还是保持了一种友谊。

其实，早在1925年，徐志摩就曾夸赞过周氏的文字，那一年12月21日《晨报》副刊上，曾发表过他的一段文字：

我接手编辑以来也快三个月了，但这还是第一次作人先生给我们机会接近他的温驯的文体，这虽只是简短的校阅，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人为学的谨慎与不苛。

徐氏是个颇有绅士气的文人，他崇尚罗素思想，钟爱泰戈尔，精神深处有一种独往独来的贵族气。他在周作人的文字里，似乎也嗅出一丝绅士的味道，觉得那从容与温雅之中，有着宁静之美与自由之美。不过，周氏身上毕竟有东方人的戾气，加之日本式的清秀，这与英国式的典雅殊为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徐氏更喜欢陈西滢，呼应的东西好像更多。早在1920年，徐氏在英国就与陈西滢相识，相似的知识背景，把他们联在了一起，所以在周氏兄弟与陈西滢论战时，徐志摩偏袒于后者，那是必然的。鲁迅对徐志摩，一直没有什么好感，在文章中多次讥讽过他，但周作人后来却渐渐容忍了诗哲，对徐氏有了一种认可感。那还是1931年，徐氏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周作人写下了《志摩纪念》一文，对诗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态度和鲁迅形成了反差：





的确和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

周作人还在文中高度评价了徐氏的创作成绩，以为其文本虽欧化，但却颇有表现力，在文学史上有相当的地位。几年之后，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周作人就认真选了徐志摩的作品，把他看成一种派别的代表。作为一名选家，周作人自然懂得诗人的分量。

徐志摩一生非常短暂，只活了三十五岁。他 1897 年生于浙江海宁，曾留学美英两国，以诗名世。他的文字华丽热烈，像一团烈火，有着浓浓的异域色彩。不过因为感情过浓，有时无法化开，倒给人一种做作的感觉。苦雨斋的文人们，写文章时大多不走徐氏的路子，大概是以为过于用力吧？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刘半农等人，崇尚的是宁静如水的篇什，所以徐志摩只是这个圈子里的偶来的客人，在人们的记忆里，只是溅起一点涟漪，随即便渐渐地消失了。

京派将领

1933 年 8 月左右，沈从文与友人杨振声离开青岛来到北京。那一年 9 月 5 日，周作人的日记写道：

杨金甫、沈从文二君来访。

同月的14日日记又载：

上午以稿送给沈从文君。

此后，周氏日记，不断出现二人通信的字样。到1934年底，两人的信件往来，有55封之多。沈从文在1925年就和周作人等人办的杂志《语丝》发生了联系，在上面发表过小说。这次与苦雨斋主人交往，乃为了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周作人自然成为沈从文的首选作者。因为那时候在沈氏的眼里，苦雨斋主人乃学林与文坛高手，其学识与文笔，是外人不及的。创办《大公报·文艺副刊》不久，沈从文就渐渐感受到了以周作人为核心的京派的力量。废名、俞平伯、徐志摩、刘半农等人，均引起了他的注意，也和众人成了朋友。他后来自觉站在京派立场，挑起“京派”与“海派”之争，是对苦雨斋内外京城文人文化认同的必然结果。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凤凰县，14岁从军，20岁来京漂泊。他未考上过大学，后来因小说成就卓著而登上文坛。1934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那一年发表了著名的《边城》、《湘行散记》，一时名振四海。不过，那一年较为重要的是，他在年初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和《关于“海派”》诸文，挑起了一场争论。一时间鲁迅、徐懋庸、曹聚仁等人，都卷入了争鸣。沈从文带着对周作人、废名欣赏的态度看上海的文人，自然觉出了他们的短处，可说是以“京派”之长，讥“海派”之短，道理是明净的。严格说来，沈从文与苦雨斋诸人，算不上挚友，相交亦淡如清水。30年代，他与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等人，参加过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彼此点头相交，并不过热。但那些交往，使他感到了苦雨斋诸人的分量。在论述周作人、废名的时候，沈氏写道：

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

